

子夏曰
博學而篤志

切問而近思

仁在

子夏曰

百工居肆以成其事

君子學以致其道

子夏曰

君子有三變

望之俨然

即之也溫

听其言也厉

子夏曰

君子信而后勞其民

未信

則以為厲己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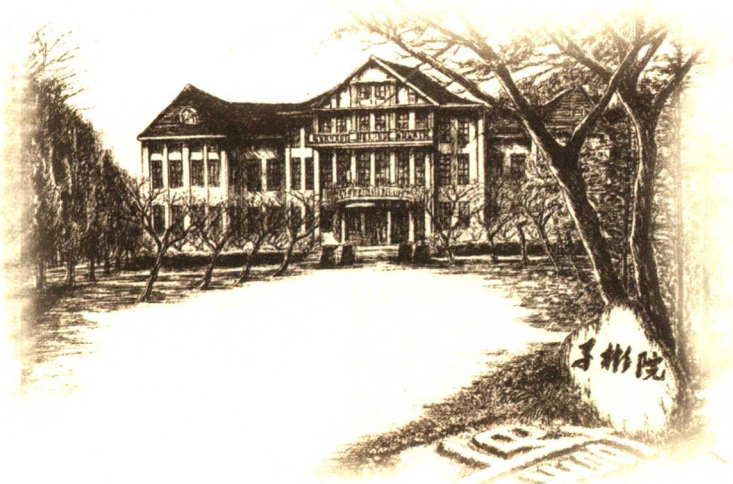
信而后諫

未信

復旦 改變人生



燕爽 主編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復旦 改變人生

近思錄

燕
爽

主
編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主 编：燕 爽

副主编：夏科家 尹东梅 方 明

参与编撰人员：

陈 雁 邵 田 厉家鼎 邓续周

(以下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)

于慧杰 龙子雯 包慧怡 江一峰

乔 锒 仲 艳 朱 莹 朱文涛

李 颖 李宗宁 吴 洋 吴科荣

陈 晋 罗 凌 周 俊 赵 光

赵 强 赵路平 钟晓华 唐楚杰

唐春辉 徐佳熹 蒋伊石 褚轶雯

潘晴燕 颜江伟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《复旦改变人生》分册之一。书名“近思”二字源自复旦的校训“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”。本书共收录了上世纪40年代到本世纪，从文科毕业或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复旦校友访谈录50余篇。绝大部分内容根据录音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，少部分为作者自述。篇目按受访校友的入校先后顺序排列。从这些回忆文字中，你可以读出一部鲜活的复旦“校史”，分享到复旦校友们的人生经验，并从中感悟到复旦这所名校的内在精神。

俾使复旦蒙其光荣(代序)

复旦大学校长 **王生洪**

61年前,在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时刻,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告诫即将毕业的复旦学生:“今日诸生步出复旦之门,终身将留有复旦之符号。诸生与复旦之此种关系,将永继续。诸生一生中如有成就,复旦将蒙其光荣。若有挫折,则亦牵累复旦,同受其害。须知造就学生者为学校,而造就学校者则其学生。”回眸复旦的世纪历程,咀嚼李登辉先生的告诫,我们不难体会:复旦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,与学生的成长紧密相连,复旦与校友荣辱与共,终始相依。

为此,在复旦百年校庆之际,学校发起了“复旦改变人生”教育活动。超过1000名学生组建了300个采编小组,采访了近300位校友,联络、访谈和整理工作累积38000多小时,录音整理稿超过230万字。学生们在访谈结束后,还志愿提交了130余篇近20万字的采访随感。

作为这一活动的主要成果,《复旦改变人生》丛书收录了其中逾160位校友的访谈录。他们当中,既有院士、政府高官、商界巨子这样一些“显要”,也有在各行各业显山露水的“精英”,还有在普通岗位上勤勉奋斗的社会中坚力量。在他们身上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“复旦精神”,铭刻着国家和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烙印;在他们不同人生的背后,都有着共同的对祖国的赤诚、对民族的热爱。从字里行间,你可以看到民族的坎坷与复兴,社会的发展与进步;你可以读出一部鲜活的复旦“校史”;你

还可以从个人的人生经验中找出“终身留有的复旦符号”。这些校友也纷纷对当下在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出看法，在肯定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、视野开阔的同时，希望学弟学妹们踏踏实实读书，保持平民心态，怀揣对知识的敬畏。真是语重心长，备见真诚。

校友是复旦发展的见证人，更是学校最宝贵的财富。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校友的支持，学生的成长也离不开校友的关爱。有一位管理学院的受访校友对联系的同学表示：“我愿意将蕴含着自己20年复旦底蕴的感情投资到学弟学妹身上！”其实，同学们采访校友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向老校友们学习的过程。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迥异的人生轨迹，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深厚的知识底蕴，他们健康的道德理想和深沉的人格魅力，对于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在校学生来说，无一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教育价值。

我要感谢为本书策划、编撰和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工作人员。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庆典前夕，《复旦改变人生》得以出版，是大家用行动向复旦历史表达尊重，向百年校园表达热爱，对历年校友表达尊敬和真诚。由于大家的努力，在校友与复旦之间、学生与学校之间、历史与现实之间，架起了又一个沟通的桥梁、又一条精美的纽带。

在文章的最后，我要以学校以及我个人的名义，衷心地祝愿复旦广大校友一如既往地奉献社会，报效国家，俾使学校更多地“蒙其光荣”；也衷心地希望复旦在第二个百年中不断发展，造就出更大量的使学校“蒙其光荣”的学生。学校和校友共同努力，使“复旦之符号”广为流传，复旦之精神发扬光大。这正是我们复旦大学和所有复旦校友的神圣职责。

目录

Contents

复旦改变人生·近思录

- 1 我与复旦的六十年情缘——余家宏教授访谈录
- 9 革命年代在复旦——张家琦校友访谈录
- 19 五十年沧桑再回首——郑兰荪将军访谈录
- 29 母校校训是我一生的座右铭——李岚清校友访谈录
- 37 学术当独立,任尔东西风——陈其人教授访谈录
- 44 复旦,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——丁淦林教授访谈录
- 51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——吴敬琏校友访谈录
- 56 大师教诲,受益终身——章培恒教授访谈录
- 63 学好外国语,做好中国人——董亚芬教授访谈录
- 69 为天下先——郑绍濂教授访谈录
- 79 我爱复旦这个“家”——王邦佐校友访谈录
- 86 冷眼看成绩——陆谷孙教授访谈录
- 95 百年复旦,教材人生——翟象俊教授访谈录
- 104 一部地图集改变人生——邹逸麟教授访谈录
- 112 医者校训 影响一生——左焕琛教授访谈录
- 120 在动荡岁月中前行——金福安校友访谈录

- 130 感觉是怀念,印象是朝气——马慧琴校友访谈录
- 140 永恒的感动——何慧娴校友自述
- 149 我的求学生涯——瞿世镜校友访谈录
- 156 复旦就是想问题的地方——秦绍德教授访谈录
- 162 勇创“海派经济学”——程恩富校友访谈录
- 168 我为一片自由的海——吕会霖校友访谈录
- 175 从军营来到复旦——魏建忠将军访谈录
- 183 从宾夕法尼亚到复旦:还原一部真实的中美关系史
——汪熙教授访谈录
- 191 我在改革开放前夕的求学经历——刘潼福老师访谈录
- 200 我的哲思天空——俞吾金教授访谈录
- 209 旦复旦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——李源潮校友访谈录
- 219 遁入传统的河流之中——陈思和教授访谈录
- 226 知青部落走出的学者——金光耀教授访谈录
- 235 “哲学王子”,以真诚和学问感染每个人
——王德峰教授访谈录
- 245 复旦让我自信——祝建华教授访谈录
- 251 复旦:崇尚学术自由的殿堂——华民教授访谈录
- 259 低调立身,沉潜为学——姜波克教授访谈录
- 268 春风化雨,润物无声——翁铁慧校友访谈录
- 277 复旦塑造了现在的我——朱国宏教授访谈录
- 285 “张军模式”与科学范式——张军教授访谈录
- 294 求真和育人是最伟大的事业——林尚立教授访谈录
- 301 抓住机遇——黄洋教授访谈录
- 310 放宽新闻的视界——孙玮副教授访谈录
- 318 复旦有高楼,上与浮云齐——陆志安副教授访谈录
- 329 到家的感觉真好——袁志刚教授访谈录
- 338 奋斗不息 认清责任——李辉副教授访谈录
- 347 “草根”历史 贵族气派——李钧副教授访谈录
- 353 成长在理想主义尾巴的时代——徐春萍校友访谈录

- 361 一个第一批“人才工程”队员的回忆——文选才校友访谈录
- 368 做一个自律的人——刘晔老师访谈录
- 374 复旦见证我的成长——王宏舟同志访谈录
- 381 复旦是我人生的加油站——胡炜校友访谈录
- 389 最佳辩手的复旦人生——蒋昌建副教授访谈录
- 400 建设复旦师生的网络心灵家园——薛云皎老师访谈录
- 407 让中国的航天产业迈向国际——金壮龙校友访谈录
- 417 “撒野”在新世纪——邹群校友访谈录
- 426 后记

我与复旦的六十年情缘

——余家宏教授访谈录



与陈望道等合影，最后一排左四为余家宏

余家宏，男，194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。曾任新闻系副主任、硕士生导师。

1950年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，历任新闻学教研室主任、新闻理论教研組主任、新闻学研究室主任、系资料室主任。

1983年获上海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，1984年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。1992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一等奖。

我的父亲在我没有出世(1916年)以前,在浙江做相当于公务员的县知事,我出世以后他就不做了。我生活在大家庭里面,靠祖父留下的一所房子来维持生计。我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错,小时候很多东西都是她启发我看的。我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少,就是抗战逃难在一起,后来他就去世了。父亲对我基本没有直接影响,母亲有,但我主要还是靠学校。

我的亲戚朋友他们,读了小学以后,一条路是升中学,还有就是做学徒。小学毕业时候,我写封信给父亲,问是去做学徒,还是去读书?他叫我读书。这也算是家里的影响。当时读书要看家里经济情况,家境好才有书读。我还有个哥哥,因为家里没有钱,去读了师范,读师范可以不要钱,还有两个表哥都是做学徒的。当时江西南昌没有大学,只有九江有一所大学,是教会学校,所以,我要读大学一定要到外地去。

我在中学的时候,一位英语老师是复旦外文系毕业的。所以在初中,我就知道一些复旦的情况。后来到高中的时候,英语老师又用李登辉编写的《英文修辞学》作为教材,我对复旦就更了解了。我就读的中学是南昌很有名的私立学校,教师都不错。我们毕业的时候,有些教师就希望我们考私立的大学,因为私立的大学终究是实实在在办学的,给人的印象比国民党办的公立大学认真些。而且那时交通很不方便,从江西到上海来要坐两次船,到北京就更麻烦了。所以当时,虽然我报名清华花了5块钱,但最终还是没去考清华。我一到上海就考了复旦,不仅仅是我,我的同班同学好多都考了复旦。

1935年,我进复旦的时候,恰巧日本准备大举侵略中国,所以,我在复旦两年多一点(1935—1937),也是学生爱国运动最高潮的时候。

我们很多教师的思想很自由,很进步。记得我读《中国近代史》,这是文科必修课,有一位姚名达老师,他是研究目录学、妇女问题的专家,一边在复旦教书,一边编妇女刊物。有一天,他上课的时候,说了一句“中国的警察只会打学生”,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。当时学生的成分很杂,大概有人去报告了,下个学期学校就没有聘他。他后来在江西的一所大学教书,在打游击的时候去世了。李登辉校长经常在校园里面走来走去,因为他中文不太好,多讲英文,学生和他讲中文、英文都可以,有时还和学生打球。有一次,我就听其他学生讲,有个学生没敲门就进去了,他就把这个学生推出来,把门关上,用手示意敲门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是我亲眼看到的,在上海补习部的时候,一个老师在上课,李登辉校长坐在后面听,那个老师讲得他不大满意,他就把老师的课本拿下来,他来讲。我没有上课,恰巧在窗户边走过,后来看见那位老师低着头出来,好像很不好意思。李登辉这个人很不容易,我们这个校长,很讲学术自由。

因为李登辉主张学术自由,重视思想自由,注重实践精神,支持学生运动,所以,过了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到1936年“三二五”运动这一段时间以后,国民党政府就不让李登辉做校长了,另外派了一个吴南轩做副校长主持实际工作,复旦大学的董事长、银行家钱新之做了代理校长,教务长章益是复旦原来的教育系主任。这样学校就变得比较听政府的话了,从这个时候到“八一三”以前,复旦的学生运动就比较沉寂了一点。鲁迅出殡的时候学生去参加,竟然都没用复旦的名义,而只用了复旦学生的名义,可见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比较沉寂的。

当时上海有抗日救国会,我们校内也有学生参加的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西安事变发生后,学生在操场上敲锣打鼓,一部分学生还在讨论今后形势会变成怎样。一个晚上都在敲锣打鼓,一部分是靠相辉堂那边,一部分是现在的经济学院那边。

“一二·九”的时候，北方大学游行，有一句话叫做“华北之大，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”。我们这里组织的人已经做好了旗帜、竹竿，旗帜上的口号是“共赴国难”什么的，具体如何准备好的我们一般学生不知道，只是一下子就都聚集到大草坪上了。也没有预先通知，我们学生都跟着去，不过也有人不去的。我们走在马路上，有的人从校车上下来就直接参加了，所以有些人都是临时参加的。当时天气很冷，12月里，又是半夜，临时参加的人衣服穿得不够，有的人就回家取衣服，然后学校就不准他们参加进来了。估计是国民党政府命令学校“只准学生出，不准学生进”，所以后来有报道说学生逃跑，其实并不是学生逃跑，而是国民党不准这些学生参加，他们想回也回不来了。

后来就“八一三”打仗了。复旦是每年暑假都要开暑期班的，一个暑假读6个学分，实际上是2门课，一般是选修课，不开必修课的。在“八一三”打仗的那年，我们是在附中开课的。一边是窗外霹雳啪啦的枪响，一边是课堂上先生的声音。那个暑期就没有读下去了。当时，大家心里很难过，都不太愿意上课。有个洪深老师，他平时在青岛的中山大学上课，暑假回上海来就在复旦上课。他教导演，就是导演一出戏，一边导，一边讲，导完了，课也结束了。“八一三”时他就说：我要去参加救亡队了，上什么课？提到洪深老师，他是复旦剧社的创始人。复旦剧社是全上海最有名的大学剧社，曹禺的《雷雨》在上海的首演就在复旦，参加的演员都是学生，只有一个明星。后来《日出》也是复旦学生先演的，不过不是在复旦，是以另一个名字在别处演的。因为当时交通不太方便，演戏一定要到市区去演。戏中的话题对我们青年学生是很有启发作用的，因为都是身边经历的事情呀！凤子，就是在《雷雨》里演四凤的同学，前两年去世了。凤子的本名是封季任，后来是有名的作家，也是个编辑。《雷雨》是由欧阳予倩（解放后任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）导演的。

在学校搬到庐山前，我还到南市的难民救济所去工作过。我记得有次看到一个老太太，小脚被打断了，一根筋就这样连着，忽悠悠的，我看了很难受，当时就想着快些救济他们，别的就都不去想了。救济所还动员我们去小学上课。

那时大家都不知道抗战要多久，日本说3个月就灭亡中国，那么究竟是3个月会灭亡还是中间讲和？大家都不知道。所以学校就先搬到庐山，没直接到重庆。认为只要仗一停，我们就可以顺着长江回来了。结果哪里晓得抗战要八年呀！

当时联大的办事处有个招待所，我们这些学生先在这里住一宿才去庐山。在一起的有好多学校的学生，有复旦的、浙江大学、暨南大学的。这个接待处原来也是一个学校，不过人员都已经搬到乡下去了，校长也在南方。我们就睡在教室里，食堂也都开放。陈毅当时就在那里演讲。我当时还不是党员，但也听了陈毅的演讲。怎么请到陈毅的呢？那还是由地下党去请的。南昌当时是前方的后方、后方的前方。有一个老师就在南昌做记者，是中央社的战地记者。有时候日本飞机来了，就躲在防空洞里面，那时候的学校都有防空洞。

学校搬到庐山，上课总算才听不到枪炮声了。庐山当时有四所大学：复旦、大夏、中央政治学校和北平艺专（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）。我们和中央政治学校联系不多，北平艺专和我们住的近，联系就比较多。北方一些歌都是北平艺专的学生教我们的，像什么《松花江上》等等。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地下党员，不过我们那时不知道。

当时我们这些学生有好几种想法：留在江西参加救亡运动；回老家江浙后方去参加救亡运动；留在武汉参加救亡运动（上海沦陷，武汉就是抗战的中心）；到陕北去；跟学校一起到重庆去……如果我们要跟复旦到重庆去，大家也需考虑怎么和家里联系呢。因为学费是家里出的，联系不上怎么办呢？特别是

广东的人，去不去都不好，因为广东算是东部，属于前线，但有的人根本不知道家里有没有沦陷，那他是去重庆好呢，还是不去好呢？谁都不知道。大家的思想都很不稳定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在上海时学校的其他活动很多，还有好多的刊物。其中有校刊，甚至还有英文校刊，我们的英文校刊叫《复旦镜报》。学校里面当时还有基督教的团体，他们自己也有报纸。现在学生也办了很多报纸吧，我们那时候学生少，报纸比起现在还算是不少的。我就参加编了一本杂志，叫《文折》，校刊上的《毛泽东自传》，就收在里面。当时“文折”是一门课，选了不上课，就是给《文折》写文章，我也选了这门课。

我们后来才知道可以公费读书。我没有去重庆，因为自己是江西人，就留下做了两年中学老师。后来听说复旦又在上海办补习班，而且是李登辉负责，我就回到上海来读完大学。1941年春天，我在上海毕业，但是拿的文凭还是重庆的文凭。我从经济系毕业以后，就在广州一家报社里面编经济副刊。另外我还在一个学院教书，教经济方面的东西。后来这个报社被国民党封掉了。封掉以后（1947年），我又回到上海，在上海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。育才学校后来办了个新闻组，新闻组是专科的，就是高中，叫我来参加负责筹办，并让我做主任。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搞新闻教育的老师了。

1949年，华东新闻学院组建。我就到华东新闻学院来，不过后来华东新闻学院没有成功地生存下来。我就又到复旦了，反正都是搞新闻教育，到哪里都一样。我想如果说，复旦改变人生是改变什么呢，我就是从一般的经济报纸编辑、从新闻编辑变成真正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了。

我在复旦教新闻的时候，出去好多次，带学生去好多地方实习，他们搞半年，我也搞半年。江西、南京我都去过两次。另外还有自己单独去报社实习，我在《解放日报》做了两年夜班。

教新闻,就要有感性知识,对社会没有点实际了解不行。我也出去采访,《文汇报》也去过。从实践中学知识。原来不懂的,到外面就懂得多了。

1950年我到复旦新闻系做讲师兼教学秘书。1956年,我去中央党校学习。回来的时候,我就只负责教书,不担任其他行政职务了,任理论教研组主任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我属于半吊子,什么叫半吊子?既不是能够参加革命队伍的造反派,又不是要关起来的牛鬼蛇神,但是每天我要上班。工宣队来了,就叫我们上课。有一天叫我去试讲课,我现在都不记得我讲过什么。只记得有个学生在我耳朵边讲:你上课之前先读两句语录。这样的学生好不好?他是怕万一我不读语录就会被轰下来了,怕我受到刺激。还有童兵老师,那时他还是学生,因为怕我们在学校里被打、被整,虽然说不一定是被打或者被整得厉害,但他还是有意把我们带着出去劳动,带到上海县一个地方去劳动,避开这个风口浪尖,实际上他是保护我们。

那时新闻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,新闻教育工作跟实际联系得很密切。我在新闻系的时候,新闻系有一门功课,叫做“读报评报”,教师每天晚上要到学生房间里去评报。这样评报实际上就是你扯一句,我扯一句,对整个报纸的编排呀、文字呀,各种东西,都要提提意见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就是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。读报评报的结论写成一条一条,不是一篇一篇的评论文章。报纸的评论文章是根据一个事写的,像国内问题、国际问题。而我们是这样的,比如,第一条:今天排的式样太大了,有什么错误、错字,还包括提法不对。有意见我们都提,比较自由。教师跟学生互相讨论,讨论完毕,到了一个礼拜,或者一定的时间,由一个学生整理,再把这个整理意见寄到报社去,是《解放日报》的就寄《解放日报》,是《文汇报》的就寄《文汇

报》。这些报纸都跟我们讲好的：你们有意见就提，提到我们这里来。他们编辑部觉得好的或者可操作的，就把意见登在他们的内部刊物上，或者开会的时候传达。

等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我做研究室主任，还短时间做副系主任。做副系主任的时候我管研究生，从第一届研究生起，都是我管的，还负责一些系里的研究工作。《新闻学研究》、《新闻学学术情报》、《世界新闻事业》、《新闻大学》四种刊物都是我负责的，我编的那些书都是“文革”以后完成的。我1985年离休，返聘两年，做到72岁。我这一生能够接近进步，能够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复旦改变的，都是复旦给我的。

复旦的精神在我看来，就是爱国、牺牲、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。复旦在南方是很有地位也很有名气的，因为一开始复旦就反对文化侵略，同时又是独立的，没有靠国家的钱。李登辉办学校的时候教育成绩了不得，经济却困难得不得了，我们私立学校教师的工资比别的学校要差得多，但是学校要我们交的学费却不很多，这些老师是真正在办学校、搞教育。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，国民党开始抓学校了，就要李登辉休息去，说他年纪大了要他休息去。后来李登辉找了一些老师办补习班，就说他有企图，日本人要登记立案，要派教师来，他说不行，说我们这里教师都有了，你们要派人教日文呀，对不起，我们教的是中文，他要学生和恶势力作斗争，不要和他们妥协，意思就是不要去做汉奸。

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特征，时代和时代是不同的。如果不因为爱国，复旦就办不起来了。复旦的学生是很爱国的，至少我现在可以自豪地拍着胸脯说自己是爱国的。我就是复旦培养出来的，我做党员也是复旦培养出来的，我参加进步活动也是，如果没有到复旦来，我们就不会参加救亡运动，锻炼的机会就没有了。

（采访整理：褚若干、张妍）